

拉美问题译丛

第十三輯

复旦大学拉美研究室

一九七四年五月

目 录

菲德尔·卡斯特罗小传..... (1)

一部政治文献—卡斯特罗答美国记者洛克伍德问..... (9)

卡斯特罗同意共《团结报》记者的谈话..... (53)

卡斯特罗同法共《快报》记者的谈话..... (57)

附 录

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 (62)

古巴的“革命指导委员会”..... (66)

土地改革法..... (70)

古巴第二次土地改革法..... (80)

古巴的卫星化..... (83)

菲德尔·卡斯特罗小传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古巴人一般称他“菲德尔”——于一九二六年（有的资料说是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生于古巴奥连特省北部海岸邻近比兰城的一家甘蔗种植园。他的父亲安赫尔·卡斯特罗——阿希斯，是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的移民工人，最后得到了两万三千多英亩的地产。安赫尔的前妻生了两个子女，莉迪亚和佩德罗·埃米略。前妻死后，他娶了家里的厨师林娜·鲁斯·冈萨雷斯为妻，她也是来自加利西亚的。他们的子女是：安赫拉·阿古斯丁娜·拉蒙（古巴农村改革计划的官员）、菲德尔·劳尔（古巴政府的副总理兼革命武装部长）、埃恩马·胡安娜（因反对她哥哥的政策，于一九六四年叛逃美国）。

童年时期，卡斯特罗在他父亲的甘蔗田里劳动。他的受教育不多的父母显然无意使他入学，但是菲德尔决心求学，在六、七岁时就说服他的父母让他读书。他在古巴的圣地亚哥市，上过拉萨尔学校和多洛雷斯学校，这两个都是耶稣会的学校。一九四二年他在多洛雷斯学校毕业后，到哈瓦那进贝伦学校，这是一所耶稣会办的大学预科。他在那里学西班牙语，历史和农业的成绩很优良，一九四四年被选为全校最优秀的运动员。

一九四五年，卡斯特罗进哈瓦那大学法律系，学习民法、外交、行政管理和社会科学，并成为好斗的“大学生联

合会”的主席。一九四七年九月，他暂离学校去参加推翻多米尼加共和国特鲁杀略总司令的独裁统治的远征，但未能成功。一九四八年四月，哥伦比亚的波哥大举行学生代表大会。作为该会的组织者之一，他参加了以“波哥大起义”著称的暴动。当时由于政治上有自由主义倾向，他在学生运动中有时与共产党人发生冲突。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卡斯特罗在一次演讲中回忆说，在思想上发展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在他取得政权以后才全部形成的。

一九五〇年，卡斯特罗获得哈瓦那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在哈瓦那同两个合伙者设立律师事务所。作为一个律师，他为那些穷而无告状能力的人仗义执言。他参加了古巴人民党。该党又名正统党，是自由主义改良派爱德华多·奇瓦斯所创立的。在一九五二年六月举行的全国选举中，卡斯特罗成为代表哈瓦那选区的国会议员候选人。不料这次选举中途取消，因为同年三月十日巴蒂斯塔将军发动政变，推翻了卡洛斯·普里奥·索卡拉斯总统的政府，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

政变以后，卡斯特罗向古巴宪法保障法院起诉，控告独裁者的夺权是违反一九四〇年宪法的。法院驳回了这个起诉，作出“革命是法律的源泉”的判决。既然不能用合法手段来反对独裁统治，卡斯特罗就帮助有理想的青年人组织反抗力量，以献身于民主、社会正义和一九四〇年宪法。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卡斯特罗率领一支队伍，约一百六十五人，攻打古巴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希望在奥连特省发动人民起义。这次攻打和对博亚莫驻军的袭击都失败了。约有半数的起义者被杀，其余大部分人，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其弟劳尔在内，被关进监狱。审讯时，卡斯特罗

为自己辩护，作了激昂的讲话，结语是“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他被判刑十五年，送往松岛。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卡斯特罗在大赦令下获释。有一段时期，他试图进行反对巴蒂斯塔政权的非暴力运动，但是政府不让他使用向群众作宣传的工具。同年七月，他去墨西哥城，不顾墨西哥当局的阻挠，把古巴流亡者组成有名的“七·二六运动”。在墨西哥城，他会见了格瓦拉。格瓦拉是一个阿根廷青年医生，后来成为古巴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卡斯特罗用前古巴总统索卡拉斯捐的钱买的“格拉玛”号游艇，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率领八十二人的一支队伍在古巴奥连特省的北部海岸登陆。

入侵者又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原来的队伍只剩下十二人，包括卡斯特罗与格瓦拉在内。但是，少数生还者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得到了一个据点，继续展开反对巴蒂斯塔政府的游击战争，志愿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赫伯特·马修斯访问卡斯特罗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打破了政府自称叛军已被消灭的说法。马修斯把当时的卡斯特罗描写成为一个“具有压倒一切的性格、有教养的献身狂、有理想、有勇气、有突出领导才能”的人。关于卡斯特罗的“七·二六运动”，马修斯写道：“这是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它又是民族主义的，在拉丁美洲这意味着反对美国佬。”马修斯曾指出，古巴的共产党人不但没有在“七·二六运动”中起什么作用，而且事实上是反对的。

从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开始，卡斯特罗对巴蒂斯塔政权宣布“总体战”。在随后几个月中，他的游击队迭获胜利，并在城市里掀起了大规模的市民反抗运动。十二月末，巴蒂

斯塔看到大势已去，于一九五九年元旦流亡到多米尼加共和国。第二天，卡斯特罗的部队胜利地进入哈瓦那，同时圣地亚哥也落到反叛者的手中。到斗争结束时，人数只有八百人的游击队，却打败了约三万人的职业军人。对于这一成就，马斯修称之为“在西半球无与伦比的一首真正的史诗。”

在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中，卡斯特罗成为武装部队总司令，而由背叛了巴蒂斯塔政权的自由派法官曼努埃尔·乌鲁蒂亚·列奥担任总统。新内阁大部分人员由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所组成，以法学教授何塞·米罗·卡多纳为总理。一九五九年一月六日，国会的两院被解散，各省及地方政府的全部官员都被撤了职。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美国承认了古巴临时政府。

在革命政府的初期，巴蒂斯塔的支持者整批地被逮捕、审讯和枪决。对于来自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批评，卡斯特罗的回答是要批评者回想一下过去巴蒂斯塔政权的种种暴行，并且宣称革命法庭要存在下去，直到“全部罪犯”都受到审判为止。在巴蒂斯塔统治下被宣布为非法的古巴共产党，现在又准许合法活动。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六日卡多纳辞职后，由卡斯特罗担任古巴总理，武装部队司令的职位则由他的弟弟劳尔担任。同年四月，卡斯特罗访问美国，他向美国人保证，古巴将遵守美国租借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协定，外国人在古巴的财产将不会被没收，他的政府与西方民主国家保持巩固的联系。

一九五九年五月通过的土地法令，建立了全国土地改革组织，由卡斯特罗担任主席。这项法令规定，分配土地给无地的家庭，废除佃农制度，同时大大限制了外国人的土地所有权。卡斯特罗巩固了他自己的权力，在遣责乌鲁蒂亚总统

破坏革命之后，于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七日迫使他辞职，由多尔蒂科斯（律师，原任革命政府司法部长）继任古巴总统。到了一九五九年末，古巴的实权已落到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亲信的手中了。

与此同时，古巴与美国的关系正在恶化，主要是由于卡斯特罗政府征用了美国人的财产，而所付的补偿费被认为是不适当的。古巴国内日益增加的反革命活动，卡斯特罗认为是由于美国的影响。一九六〇年二月，古巴与苏联签订了协定，规定古巴购买苏联石油，苏联购买古巴的糖。几个月后，美国大量削减从古巴进口食糖的限额。一九六〇年九月，卡斯特罗去纽约出席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在会上与苏联总理赫鲁晓夫进行了友好的会晤。卡斯特罗在大会的发言，攻击了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在卡斯特罗政府实际上没收了全部美国财产并同共产主义国家达成更多的协议之后，美国政府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断绝了同古巴的外交关系。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约有一支一千三百古巴流亡者的队伍，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非官方的赞助下，向古巴南部海岸的猪湾发动了一次入侵。在入侵者被击败，其中多数人成为俘虏以后，卡斯特罗胜利地宣称，“多少个月来由美帝国主义政府组织起来的部队，已被革命力量摧毁了。”卡斯特罗对于被他称为“外国雇佣的侵略军”的胜利，增强了他在国内的声望，同时使他更加靠拢共产主义世界。在他的一九六一年“五·一”节演说中，他称古巴为“社会主义国家”，并宣称政府不再举行选举，从此以后将要在群众大会上依靠人民的直接支持。他还说，“革命不打算给压迫阶级以任何机会重新掌握政权。”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日，他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是适合我国的客观情况的。”一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古巴革命统一组织”，由卡斯特罗任第一书记。一九六三年，这个组织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所代替，并于一九六五年十月改名为古巴共产党。

一九六二年十月，肯尼迪总统根据情报透露，苏联正在古巴建造远程弹道导弹基地，于是卡斯特罗的古巴成了世界危机的焦点。据肯尼迪的看法，那些武器构成对“所有美洲国家和平与安全的明显威胁”，并且打乱了东西方的核均势。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肯尼迪宣布对运往古巴的一切军事装备实行检查，并在美洲国家组织的支持下建立了对古巴的封锁。卡斯特罗坚持说那些武器是防御性的，并谴责美国破坏“我国和全体人民的主权”。几个星期以后，赫鲁晓夫同意撤出导弹，肯尼迪终止封锁，危机始告平息。同时，卡斯特罗政府与“古巴家属委员会”的代表唐诺文律师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规定用一千一百一十三名入侵猪湾的俘虏，交换价值五千三百万美元的食物和药品。关于这个协议，一九六三年一月卡斯特罗说，“帝国主义付出战争赔款，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导弹危机后，古巴与苏联的关系冷了一些。卡斯特罗没有参加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谈判，他批评赫鲁晓夫没有为古巴争取到更多的让步。一九六三年一月，他声言古巴不受苏美协议的约束，并表示他可能转向中国取得支持。但是，古巴继续从苏联得到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而且有时卡斯特罗政权公开站在苏联一边反对中国。另一方面，一九六七年，卡斯特罗责备苏联和其他欧洲共产党国家与拉丁美洲的寡头政权建立关系，不支持西半球的革命游击队。一九六八年二月，卡斯特罗政权把几个亲苏的古巴人当作“革命的叛徒”

投入监狱，其中有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入侵捷克，卡斯特罗仅表示不热心的同意，他宣称苏联的行动虽无法律根据，但在防止捷克“向反革命方面前进……投入主国主义怀抱”是必要的。

尽管古巴与美国的关系仍然互相敌观，卡斯特罗却表示愿意同美国的关系正常化。他表明，古巴将停止在拉丁美洲搞颠覆活动，如果美国和美洲国家组织也能这样做的话。一九六五年，通过瑞士这个中间人，古巴同美国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协议，允许古巴人移居美国。曾领导过游击队的格瓦拉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在玻利维亚被杀死后，古巴对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支持走向退潮。最近，卡斯特罗表示，拉丁美洲的革命可能不依靠暴力的游击行动就会发生，并举出一九六八年十月秘鲁左派民族主义军政府取得政权作为例子。

一九六八年，卡斯特罗开展新的革命攻势，来提高生产力和根除私人企业的最后痕迹。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日古巴革命十周年纪念日，卡斯特罗号召这是挽救古巴落后经济的“决定的一年”。他公布了一项长期农业发展计划，而把以前宣布的工业运动无限期地搁置。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四日，卡斯特罗正式开展了一九七〇年的蔗糖增产运动，他说这项运动要继续下去，直到达到每年一千万吨的目标。

当权十一年后，卡斯特罗仍是古巴人民的“最高领袖”，他的“菲德尔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拉丁美洲个人主义的奇特混合物——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工人和农民在改善劳动条件、卫生保健和教育方面得到了好处。占古巴八百一十万人口中百分之二十七的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大部分在生活中已成为一体。在另一方面，卡斯特罗自己承认，犯罪、怠工、文盲和工业生产效率低，继续使他的国家感到麻

烦。称为“保卫革命委员会”的保安小组，对于公民生活进行严密的监视，几千名持有不同政见的人仍然在狱。反对派的报纸或政党是不许可的，很少有希望回到法治政府。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苏联授予卡斯特罗列宁和平奖金。一九六三年五月，他得到列宁勋章、金星勋章和“苏联英雄”的称号。他的演说译成英文出版的有：《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蒙卡达审判的辩护辞》以及《主要演讲集》。卡斯特罗在古巴军队中保留上校的军衔。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同学米尔塔·迪亚斯——巴拉特结婚，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巴蒂斯塔政权的官吏。一九五五年离婚。他们的儿子菲德尔，大家叫他“小菲德尔”，先在美国上学，后到哈瓦那大学。据古巴流亡者的消息，一九六二年卡斯特罗又与圣地亚哥的伊莎贝尔·科托结了婚。一九五九年一月二日的《纽约时报》曾把卡斯特罗的外貌描写成为“魁梧、大个子、低嗓门的人”，他“喜爱步枪和雪茄烟”。卡斯特罗身長六英尺左右，棕眼，棕发，生活简朴，通常穿一套旧军服。他曾一度被认为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后来与教会当局发生冲突，于一九六二年一月被教会开除。他喜爱古典音乐，他爱好的运动项目有垒球、排球、游泳和潜水。

译自美国《现代传记》杂志 1970 年 7 月号（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国际组译）

一部政治文献

美国记者洛克伍德几天前写道：“和卡斯特罗的谈话是异乎寻常的，在没有习惯以前甚至是令人沮丧的，除非和他谈话的人占上风，能够控制住谈话，否则，这很难说是双方会话，毋宁说是冗长单调的独白，只是偶尔插进几句提问而已”。最近十年来凡是同卡斯特罗谈过话的记者，用不同的语言一致表示了这一同样的感觉。然而，可以肯定，很少的人能象洛克伍德那样，同古巴总理进行一次如此长时间，如此深入的谈话。卡斯特罗同洛克伍德在松树岛就有关古巴革命和同美帝对抗的所有问题在整整一个星期的令人疲惫的夜里进行了长谈，这次谈话的录音带可以播送二十五个小时。

洛克伍德准备将谈话内容写成名为《卡斯特罗的古巴，古巴的非德尔》的专著（定于明年三月出版）。在这以前，上星期出版的《花花公子》月刊1967年1月号提前刊登了谈话内容。卡斯特罗访问记这篇报道一发表，就象卡斯特罗谈论切·格瓦拉的情况一样，立刻被用电报发至世界各地，登在报上最显著的地位。本报现刊登洛克伍德所写材料的第一部西班牙文全文翻译。毫无疑问，这是一部重要的政治文献。

卡斯特罗答美国记者洛克伍德问

第一部分

洛克伍德问：1959年当您取得政权时，您认为古巴和美国的关系比现在要好些吗？

卡斯特罗答：是的，那是我的一种幻想。当时我们认为，我们的革命纲领能够在美国人民深刻理解的情况下得以实现。我们认为，既然它是正义的，就会被接受。说实话，我们想到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美国人民，以及美国舆论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政府的决策。我们没有看清的是，受到革命影响的利益集团控制着美国舆论的工具，它们歪曲古巴的情况，在美国公众面前加以丑化。

问：当年四月您到美国去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吗？

答：是的，为了要作出努力使美国舆论获得较好的情报，以正确对待我们的革命。要知道那里正在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反宣传运动。实际上我在美国没有同政府接触，而是同舆论界接触。

问：然而，您同尼克松副总统会面过。

答：是的。我是应出版界一团体的邀请而去访问的，并不具有官方性质。但是，由于我们保持外交关系，有过几次我们姑且称之为“礼节上”的交往。同当时国务卿（克里斯兴·赫脱）共进午餐。应邀同几位参议员谈话。尼克松也愿意同我对话，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叙谈。他写了谈话记要，确认从那时起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是一个危险人物。

古巴是怎样成为共产主义的

问：后来美国政府采取的敌对态度同古巴制造的接受共产主义的气氛有联系吗？

答：我是这样认为的。同样，苏联的友好行为也有影响。1960年我们同苏联建立的联系锻炼了革命人民和领导人，使他们的思想充分成熟。这无疑教会了我们在革命初期不完全理解的东西：能真正帮助我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盟友

正是那些刚刚在本国实现了革命的国家。我们有机会证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除了这个名词之外，还懂得了一些东西。

问：然而，有些观察家断言，您转变到共产主义是美国挑起的一系列敌对行动造成的反应。就是说，实际上是美国迫使您和古巴加入共产主义阵营的。

答：美国及其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到处使人民成为革命者，这是现代国际形势的一部分。这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的确是许多原因之一。可以说美国的政策正在加速革命运动，使之更激化。不单在古巴，全世界都是如此。

问：您认为不管怎么说您本人当时一定会成为共产党人吗？而美国的态度和行动仅仅是加速了这一过程？

答：可以说，由于美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就注定要转变为共产党人的。

问：您在1959年掌权时是共产党人吗？

答：那时我的表现可能要比我的实际情况温和些。但比我自己感觉到的更为激进些。在没有经历一个过程之前，谁也不能肯定能得出某些政治结论。谁也不能在一天、甚至一年内得出这种结论。在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早以前，当我进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时候，首先碰到的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生产过剩以及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引起的问题。我第一次致力于研究这些课题。为什么人类的技术进步会和它对幸福生活的需求发生冲突，以及为什么总得有这种冲突？某些产品怎么会过剩，怎么会引起失业和饥饿？机器应该对人类有巨大的帮助——正是这种帮助能使人们摆脱贫困、穷苦和匮乏，为什么机器的利益同人类的利益应该有矛盾？

因此，我开始考虑关于生产和所有制的各种组织形式，尽管这种考虑是完全唯心的，是没有任何科学基础的。您可以说，我已开始转变为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时我尚未读过《共产党宣言》，对于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了解很少。我在法律系二、三年级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后来我读了《共产党宣言》，获得深刻印象，我第一次看到以战斗的形式问题作出的系统的历史性的解释，使我完全信服。

此后几年中我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大量著作，使我获得了许多新的理论知识。这些革命思想在政治上指导了我。但是，掌握理论知识这不能自认为就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毫无问题，我有造反的性格，同时，对这些问题有无限的好奇心。马列主义知识使我日益倾向于政治斗争。尽管这样，我还不能称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问：是巴蒂斯塔的政变促使你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吗？

答：不，但当时我已经具有必须改革结构这一明确的政治思想。政变之前，我一直想利用议会这一合法手段作为出发点，自此我可以制订革命纲领。利用革命纲领来动员群众，而不是作为直接实现这种改革的手段。那时我深信，只有通过革命道路才能实现改革。对理解这一问题，当时我对现实已经有了充分的感受。

然而，在有些方面我是天真而错误的。那时我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自认为是一个共产党人。尽管形式上读了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但不全理解。我不能正确估价帝国主义现象和古巴形势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受到小资产阶级教育下养成的习惯和思想的很深的影晌。我出生于地主家庭，又在教会学校念过书，我所具有的仅仅是一种敢于造反的气质和正直的品质，以及教士所灌输给我的严格的性

格。大学毕业时，我在政治上还缺乏锻炼，但可以说我进步很快。因为我进大学时，还是一个政治文盲。

事实上，我的政治觉悟远远高于我学生时代参加的政党。这个政党原来纯粹建筑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上，但一度被地主和机会主义者把持。在全国多数地方，它的机构被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控制。我和党内的政客机构毫无联系，但在群众中我有一定的影响，为我当选为哈瓦那省议员候选人开辟了道路。我获得近八万人的通讯处，利用国会议员邮政特权——因为我无钱买邮票——每个月发出几万封信。这样，我为当选为党的议员争取到了群众的充分支持。

到那时，我已以革命者的火热感情进行工作了。我第一次意识到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战略：一旦进入国会后，我就要打破党纪的束缚，采取种种措施提出一套完整的纲领，这些措施在革命胜利后成了法律。我考虑到，这样的纲领议会决不会通过的，因为议会里大多数议员是地主的传声筒，是古巴和外国大企业的传声筒。但我希望通过这一深刻反映群众意愿的纲领来建立革命的讲坛，以此为中心动员广大群众：全国的农民、工人、失业者、教师、工作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其他进步人士。

巴蒂斯塔政变后，形势急转直下，我的思想也改变了，不是组织一个运动，而是企图把各种反巴蒂斯塔的力量联合起来。我原来想仅仅作为一个战士参加斗争。我开始组织第一批小组，希望同那些准备好了完成反巴蒂斯塔斗争的基本任务的政党的领导人一起工作。我的唯一希望是有一支步枪，随时准备执行战斗命令。我急于想找到一位领袖，但这些领导人没有一个对于推翻巴蒂斯塔显示出有能力，有声望，有办法，也没有人严肃对待这一事业。因此最后我们自己制订

了战略。

我没有经费。但我告诉战友们说，我们无须从国外进口武器，我们的武器就在古巴。就在巴蒂斯塔的军械库里，擦得亮亮的，保管得好好的。我们攻打蒙卡达兵营就是为了夺取这些武器。

问：那时候，你的政治立场如何？

答：我当时的政治思想已在攻打蒙卡达兵营后法庭审判时我作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篇讲演中阐述过了。那时，我分析了我们社会各阶级的成分，指出必须动员工人，农民，失业者，教师，脑力劳动者，小业主同巴蒂斯塔政府作斗争；拟订了有计划发展经济的纲领，即利用全国一切资源促进其经济发展。我在法庭上的讲话，成了后来付之实践的一切事情的种子。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称它为马克思主义的讲话，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概不会承认的。然而，它无疑是一项进步的革命纲领。这个纲领公开发表了。

问：你们公开支持用暴力推翻政府，难道不会威胁你们自己的生存，因而破坏你们的计划吗？

答：实际上是不会的。在古巴，人民好久以来一直在议论革命和革命纲领，而统治阶级已经不以为然了。他们认为，我们的纲领只是又一个纲领而已，一切革命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演变成保守派。事实上，我的思想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激进了。

问：那个时期，你的前财政部长（实系工业部长——译者注）切·格瓦拉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您的政治导师吗？您现在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是有贡献的吗？

答：在攻打蒙卡达兵营时，在编写《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时，在大学里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列宁著作时，我还

没有认识切·格瓦拉，我认为认识他时，他在思想上比我更革命，在理论修养上，他更成熟，是一个比我更进步的革命者，但那时我们不谈这些问题，而谈反巴蒂斯塔的斗争、进入古巴和开始进行游击战的计划。但毫无疑问，他对革命斗争和革命过程都是有影响的。

切活着，并且很健康

问：在切·格瓦拉去年神秘失踪以后，美国报刊普遍猜测，说他可能是被您命令处死的，这是真的吗？

答：这类文章的作者，应该尊重历史事实。事实是切活着，并且很健康。我和他的家属及其朋友们时常收到他的来信。然而，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无可奉告，否则的话是愚蠢的，对切来说可能是危险的。当他愿意公开他的地点的时候，当他愿意，并且希望别人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首先将告诉古巴人民，因为他们有权知道。在这以前，实在无可奉告。

问：您在马埃斯特腊山开始组织武装力量反对巴蒂斯塔时，是同格瓦拉在一起的。您是在那个时期转变为共产党人的吗？

答：呃，无论如何我不是——如果这是您想说的——伪装分子或渗透分子。但如果你问我在山区时期是否自认为是一个革命者，那我就回答：“是的”，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革命者。如果问我是否自认为是一个马列主义者，那我就回答说：“不”。我还不认为是马列主义者。如果问我是否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人，一位正统的共产党人，我就说“不”，我还未认为自己是一位正统的共产党员。但今天我说“是”，我相信我有这个权利。我已经经历了这个过程。今天，我看清